

谁是二十一世纪的大师

刘 公

宁夏人民出版社

谁是二十一世纪的大师

公 刘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宁夏新华书店发行 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5 字数：113千 插图：2

1986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600册

统一书号：10157·258

定 价：0.95 元

目 录

答《喀什噶尔》编辑部·····	1
西北望长安·····	3
读《对衰老的回答》·····	10
《母亲——长江》小引·····	15
《深沉的恋歌》序言·····	18
《骆驼》题记·····	22
也算自传·····	23
《大上海》自序·····	29
受奖之后·····	33
恢复名誉和保持名誉·····	35
序杨牧的《野玫瑰》·····	37
构思的准和巧·····	42
田野音乐会上的歌手·····	46
喜读李钢新作·····	62
试谈革命的边塞诗派·····	64
对伊犁诗友们的希望·····	70
听母亲的话·····	72

期待诗歌评论的更大繁荣·····	76
诗要让人读得懂·····	80
焊工与流浪汉的诗论·····	93
开拓精神万岁·····	100
谁是二十一世纪的大师? ·····	103
徐明德和他的诗·····	107
《南船北马》编后随笔·····	111
爱雨的诗人·····	113
生活创作漫谈·····	119
在《山西文学》诗歌座谈会上的谈话·····	128
答山西大学中文系学生诗五十问·····	132
诗品与人品·····	147
质量第一·····	158
简评《谒包公祠》·····	162
闲话二三·····	167

答《喀什噶尔》^①编辑部

收到你们公开发行后的第一期刊物，心中有很多感触，千言万语，归结一条：天底下自有沉默、勤恳而踏实的耕耘者。你们就正是一批。

嘱我对刊物发表一点感想，而我却只能谈些许印象，说错了，请大家海涵，当然，有出格的，还应当批评。

第一个直观是，封面很美，有地方色彩，唯其有地方色彩，才能置诸全国的橱窗中，别具一格，这本是符合辩证法的。

我翻了翻内容，小说弱一些，不独贵刊如此，似乎多数期刊都呈现了这种不景气。

诗歌当中，窃认为李千韵同志的《青青的骆驼草》是一首好诗，如果是处女作，我就更高兴了。王山（听说是王蒙同志的儿子）同志的《我是秋天的儿子》也相当诚挚地表达了他的心声。

杨牧同志的创作经验，发自肺腑，毫无暮气，我很欣赏

^①《喀什噶尔》1984年改换刊名为《丝路》。

它的朴实和谦虚，尤其是其中这么两句话：“自厚不算真正的厚，读者能有填充的余地才算厚。”假如我没有领会错的话，他在这里当然不仅仅是指艺术上的含蓄，而更主要的是指思想上的深蕴。这个意见对当今的某些青年同志大有裨益。

我也非常羡慕蔡其矫同志以六十三岁的高龄犹作壮游。我相信他会献给新疆一部好诗的。入疆，乃是我多年梦寐以求的事；五七年叩了门环——几乎到了星星峡——却奉召而回。去年又萌生此念，在甘、青、陕三省转了三个月，却终因缺乏路费（我们这儿不可能报销，去年也全都是那三家邀请并承担一切费用的）不敢西去。且看有生之年，能否得此机缘吧。

最后一句话是，希望多发表维族和其它兄弟民族作者的作品，不要求全责备。同时，在提供园地的过程中，锻炼和造就较多的翻译家。

我因杂务较多，脑血栓病迄今尚未完全“投降”，日常工作（包括读书看报）时间有限，你们的刊物读得迟了，这封信字迹又潦草难辨，希原谅。

（1982.3.合肥）

西北望长安

——寄语陕西中青年诗人

《延河》一九八一年六月、九月、十一月和十二月四期，相继在《陕西中青年诗人介绍》的栏目里，向全国推荐了十五位诗人的共计五十五首诗作。编辑部嘱我谈一点意见，我答应了。为了尽可能切实，我把这些诗反复读了三遍，其中有的还读过四、五遍。只是杂务缠身，又有病，一耽搁就是半年，直到今天才拿起笔来写这篇读后感，这是应当向编辑部和十五位诗人同志们深深抱歉的。

大凡多写了几首诗，就会被称作诗人。我也算上一个。所以，我们是同行。既是同行，我就特别希望这是一次非正式的、无拘束的闲谈。在我是姑妄言之，在对方，理所当然地不妨姑妄听之。这大概就是平等吧。常听人说什么诗的王，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没有什么诗的王，只有诗的共和国。自封为老大，到后来很可能真的既老且大，反而失去了一般人的同情与尊敬。因此，无论诗写得多么好，也不要自封老大。在人民的大海里，在历史的长河里，我们作为一滴水，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如果我们有幸变成电，变

成光，变成热，或者碰巧滋润了哪一株枯苗，那不过是对诗人这一光荣称号的小小注脚，是诗人的本分。

我是《延河》的老朋友。年复一年，《延河》给了我一个总的印象：诗比较弱，不如小说，甚至不如评论。自然，这个总的印象和个别的例外情况并无矛盾，如《司马祠漫想》一诗就荣获一九七九——一九八〇年全国中青年诗人新诗优秀作品奖。但是，作为一个兵种，在陕西全省的整个的文艺队伍中，毋庸讳言，实力不是那么雄厚，阵容不是那么整齐，也没有在诗坛上，旗猎猎而鼓咚咚，杀出自己的威风来。怎么会形成这种状况的？需要认真思索，也许，这种思索会带来一些不愉快；然而，一旦有所突破，岂不也会带来普遍的欢欣鼓舞么！

对于这十五位诗人的五十五首诗，有人建议我逐人逐首点评，我想，不如抽取若干大家都可能关心的问题，和编者、作者、读者一块儿交换想法；这当中，有的也许有针对性，有的也许并没有针对性，不过是我的一点感触，说错了，请给予批评。

七十年代以来，有一个流行的新闻名词，所谓能源危机。诗（也包括其它的姊妹艺术）会不会也发生什么能源危机呢？我认为不会，永远不会。诗只要扎根于无限丰富无限生动的社会生活，诗就不会产生恐慌感。生活中的诗意是采掘不尽的，何必恐慌呢？有一种把写诗和采矿相提并论的说法，如果仅仅从要求精炼的角度去理解，这无疑是对的。不过，我们必须同时明确地认识到：诗矿，即生活中的诗意，

毕竟不等于自然界的金属矿或者非金属矿，它没有极限，没有终结，不会出现枯竭现象，不会出现“再也没有了”的一天，一句话，诗是开不尽的矿。这正是何以古往今来的无数诗人，总能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的秘密所在。万一有一天我们感到笔端枯涩，我们最好不要嘟囔：全都写完了，再也没有新鲜东西了。我们应该做的倒是：反省一下是否自己无能，或者麻木，或者干脆辜负了生活。（不错，也有形格势禁、客观上不允许的情况，例如，“四人帮”横行时期；但那也只是不能公开发表，不等于不能写。）一般地说居绝大成分的原因是我们在生活面前怠惰了，不用气力，不敢冒险，不细心，不动脑子，而这四个“不”又可以用一个“不”来概括：不负责任。

诗中一定要有“我”。现在，对这一点似乎不存在什么大的争论了。其实，散文、报告文学、戏剧、小说等等当中，又何尝没有“我”？我以为，都是有“我”的，只不过比较隐蔽，不象诗，特别是不象抒情诗那么突出，那么赤裸裸罢了。什么是“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回答：“我”就是具象化了的作者的立场、标准和品格，就是作者的主观能动作用；这种主观能动作用一旦与客观世界（社会的和自然的）相结合，就产生了诗和其它作品；结合得越正确、越充分、越深入，作品就越好。诗是通过哪座桥梁到达别人的心灵的呢？正是通过这个不能替代的坦白真挚的“我”。这也是我个人多年来努力，却不曾完全实现的目标之一。

然而，上面谈到的不过是事情的一半，另外必须补充的

一半是：但又不能仅仅是“我”，也就是说，我不赞成趋于极端，把什么“追求自我”、“表现自我”当作诗的第一任务乃至唯一任务。真理多走了一步，就会变成谬误。混淆“诗中要有我”和“诗的任务是追求和表现自我”这两个命题，其后果是严重的。近年来，有一部分青年诗作者身陷迷途，离人民，离时代越来越远，我想，根由怕正在于此。不能为了反对现代迷信，就掉过头去每个人都把“自我”送上神龛顶礼膜拜。不知道陕西的同志们注意到没有，我从某些狂热讴歌“我”的诗篇中，闻到了一股变质的霉味——用极端个人主义的“泛神论”代替绝对蒙昧主义的“一神论”，难道这能叫做思想解放吗？能叫做进步吗？如果从这里再回到前边提过的那个采矿的比喻上去，那么，任何神经正常的人都不难预见，所谓“自我”这个矿体——即便它曾经一度是品位颇高的富矿——终有尽时；有朝一日“罗掘俱穷”，大概就只好唱些老调和滥调了。如果真的落到那步田地，又有谁听呢！

要而言之，既要坚持诗中要有“我”，又要坚决反对搞“自我崇拜”，这便是我的主张。从十五位诗人的作品中，还找不到后者的迹象，这是令人欣慰的。唯愿永远不要出现这种迹象，唯愿我们大家都能做到：只要呼吸尚存，就和祖国一道前进，哪怕路途曲折，步履艰辛；唯有如此，我们的眼前才会不断展现新的视野，手下才会不断开拓新的境界。

根据刊物所加的小引，我了解到，十五位诗人就有十五种不同的出身和经历，而作品又使我看到了十五种不同的气

质和趣味，同时，起步也有迟有早，这些只是彼此间互相区别的一面。然而，我也感觉到了互相一致的一面，这就是：都站在一道门槛上，都有待于迈出去关键性的一步。所谓门槛，具体一点讲，就是：到了这样一个时刻，无论写什么，猛一看都象诗。请注意，我说的是象诗，不是说一定是诗；这里面隐藏着一种危险，假如我们不清醒的话。拿我来说，我自己也并未完全脱离这个阶段，何况，有时候我也不够清醒。因此，我可以和大家一样：立足目前，回顾过去。尽管构成这一危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因人而异，不过，有一条却是十分明显的：我们都掌握了一定的技法，即或有点破绽，遮遮盖盖，修修补补，好歹能“糊弄”过去。“糊弄”谁呢？第一个对象是诗人本人，稍一放松，就能得到自己的通过。再遇上慈悲为本的编辑，不象跳高运动的裁判员那样，把竹竿往上提一格，从严要求，那么，发表也是比较容易的。而一经发表，仿佛就得到了某种确认，反过来又会助长我们的错觉，真以为质量满可以了。悲剧恰恰从这儿开始。我有一个体会，每当我把要写的诗当作处女作一样去写，结果总比较差强人意，反之，就写不好。这就是说，要多一点兢兢业业，少一点踌躇满志。写什么？为谁写？怎样写？自始至终，同样都存在一个责任感的问题；强调责任感，就是作者把担子直接地、主动地、自觉地压在自己的肩上，而不是消极地防范和躲避。我以为，一个有责任感的诗人，肯定是一个热情而又严肃的诗人，他不会马马虎虎地写，潦潦草草地写，也不会写不出来硬写，更不会明知道不

能那么写，却为了写作以外的什么考虑，强迫自己作违心之论。

诗之所以为诗，全看有没有诗意。没有诗意，分行，押韵白搭，或者反其道而行之，任意建行，根本无韵，同样白搭；堆砌华丽的词藻白搭，或者象时下流行的那样，搞一些扑朔迷离的障眼法，叫人莫测高深，同样白搭。读者一旦发觉上了当，就再也不买你的账了。毫无疑问，这一类货色也终将是有见识的评论家所不取。一个写诗的人，想要避免咀嚼这种悲哀，办法只有一个：追求诗意，使诗首先成为诗。写到这里，我愿与陕西的中青年诗人们共勉：不懈怠地刻意地锻炼捕捉诗意的特殊劳动本领，一旦捕捉住了，就切莫轻易让它溜掉。我不能不坦率地说，在我们已经读到的五十五首诗当中，不止一次地令人惋惜：不知道为什么，本来已经捉住了的诗意，又随随便便地放走了。

不知道十五位诗人读到那种“诗歌作法”一类的指导性文字时作何感想，在我，往往觉得可笑，哪有那么多的禁忌！议论不可入诗，术语不可入诗，典故不可入诗，大白话不可入诗，标语口号不可入诗，归纳一下简直不难凑足一个“摩西十戒”了。我是不信这一套的。因此，我忍不住要向你们宣传，别听这些话吧，别让这许多清规戒律捆绑住自己的手脚吧。我在坚决运用形象思维（这自然是根本）的同时，只有一条禁忌：废话不可入诗。我去过桂林的芦笛岩，芦笛岩给了我一个启发。大家都知道，桂林一带多石灰岩溶洞，这在地质学上叫做喀斯特地形；一个一个的山洞，千姿

百态，鬼斧神工，本来就够奇够美的了，经过人工整修，再用五颜六色的电灯一照，必然更教人兴起如入迷宫的幻觉。这个灯光，好比诗里的点化。我以为，诗人真有功力，什么议论、术语、典故，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就是土得不能再土了的大白话，最叫读者头疼的标语口号，只要安排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也照样能收到好的效果。甚至还能引起一阵纳闷和惊叹：它不上场，还不带劲哩。到了这种时候，举凡议论、术语、典故、大白话、标语口号，就一概变成了菜肴中的花椒、辣子、大蒜、葱头和醋、糖之类，缺了它，会反而少了一味。当然，它们再好也不可能代替盐，盐是形象，寓思想于形象的形象。我说这些，绝没有提倡在诗里大发其议论，滥用术语和典故，排斥文采，或者回到标语口号化老路上去的意思，我只是想说明，不用害怕这些，不但不用害怕，还应当把它们“俘虏”过来，供我们驱遣。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此之谓也。联系起五十五首诗作的某些政治色彩比较浓烈的篇什，就难免有失之太露、太频、太杂、太乱的遗憾。不是犯了什么忌讳，而是用得不当，缺乏选择和斟酌，过与不及，都是不当。因为，这些东西入诗，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毕竟和中医处方时，配上那些有风险的全蝎、蜈蚣、巴豆和附片一样，配不配，配多少，是必须慎之又慎的啊。

祝同志们多写好诗！

1982.5.8.合肥

读《对衰老的回答》

旅途中得到一本今年七月号的《星星》，浏览一遍后，目光立即被一首题名《对衰老的回答》的诗篇吸引住了，于是又回过头来反复咀嚼多次。应该承认，仅仅说一声感动，已远远不足以表达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我必须说，我十分的激动，我愿意公开为它喝彩！

我觉得这是一件可以列入“好诗三百首”专栏的佳构，尽管编者同志谨慎地在它的左上角标明“新星”二字。当然，以严肃、负责而又热情的态度对待任何作者的诗文，是复刊以来的《星星》的一贯刊风，这一次也不例外；而这首诗，作为一位问津诗坛不算很久的新人之作，一经这样处理，反而更以其本身的不同凡响，而加倍引人注目了。

我不认识作者周涛同志，除听说在新疆工作外，其他情况一无所知。在目前某些“诗人”不以具有双重人格（包括政治道德方面和生活道德方面）为耻的情况下，来评论一个素昧平生者的诗作，可能要冒一点风险。但我不相信我会再一次吃后悔药，因为，依我看，周涛同志的这首诗，不是一时一事的即兴挥洒，而实在是他对人生，对革命进行过认真思

索的结论；这种思索，当然是一场必须动员每一个细胞参与作战的精神搏斗。它的后盾不在于才华（尽管需要才华），而在于人格的力量。

首先，我赞赏通篇流溢着的诚实、积极、乐观、豁达而又有自知之明的正常人的情绪，诗人把读者当作亲密的朋友，推心置腹，娓娓而谈；没有故作惊人的慷慨，也没有欲吐又止的忸怩，更没有装腔作势的玄虚，写得腑脏俱见。这对近年来在少数人笔下演变得简直不象诗了的所谓“从现在开始，从我开始”的“新诗”，无疑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和有利的驳斥；这说明，把诗当作诗来写（而不是制造梦呓），把写诗当作社会性的生产劳动（而不是在抒情主人公与全社会之间制造对立），把诗歌当作一种有益于人民身心健康的精神营养品（而不是在客观上制造污染），把诗歌乃至整个文学作为庄严的事业来对待（而不是做买卖，看行情，跑江湖……），不但是可以办得到的，而且是大有可为的。我相信，每一个真正热爱新诗的人，从中都至少能得到一点启发，这就是：一旦你把良心和热血放进你的作品中，你的作品就会具备动人的素质。

常常听到一种评论，说某某人的诗，思想大于形象，意思是议论多了，形象却单薄了，哲理深了，感情却肤浅了。乍听之下似乎颇有道理，所以我也在答复作者的来信时，跟着说过两三次。但随后仔细一想，不对了。这话经不起推敲。究其根由，并非语义学上出了什么毛病，而实在是美学上于理不通。要是这个说法得以成立，思想和形象就可以完

全割裂开来了，我们只好最终回到政治标准第一和艺术标准第二的二元论的老路上去。周涛同志这首诗，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证明思想和形象不但应该是统一的，而且是可以统一的。在一首成功的诗里，不会有什么离开形象，不具备感情色彩而单独存在的思想。这是我的认识，周涛同志的这首诗，更加巩固了我的这一信念。我要谢谢他。

还有一点也是有教益的，即：《对衰老的回答》表现了作者不但勤于思考，善于思考，而且是用诗人的方式去思考。因此，神思飞动，文采照人。能读到如下这些诗句，我是十分快乐的。

“但是别怕！”我安慰自己！

人生就是攀登。

走上去，不过是宁静的雪峰。

死亡也许不是穿黑袍的骷髅，

它应该和诞生一样神圣……

还有：

我愿接受命运之神的

一切馈赠

只拒绝一样：平庸。

作者给“老人的美”下的定义是多么发人深省啊！

我会说：“我生活过了，思索过了，
用整整一生作了小小的耕耘。”

.....

岁月刻下的每一笔皱纹，
都是耐人寻味的人生辙印……

（请注意“整整”和“小小”这一组于平淡中见功力的对比，同样，请注意“皱纹”和“车辙”这一个由形似而升华为神似的联想。）

在分别替身躯、头颅、手臂作了正确的选择与安排之后，意犹未尽，又添上两行神来之笔：

哪怕躯壳已如斑驳的古庙，
而灵魂犹似铜铸的巨钟！

我要说，这才是勇敢者的宣言！高尚者的心声！

诗中还有不少立意精辟和匠心独运的构思，例如，开篇落笔，就通过孩子和青年的眼睛描绘“衰老”，前者根本不知衰老为何物，从而不相信世上有死亡一事，因为他们是活泼泼的“新鲜的生命”；后者虽然有了衰老与死亡的概念，然而自身正处于生命的旺盛亢奋阶段，“没功夫去想”以后怎么办的问题，道理也十分简单：“火焰”不理解“灰烬”。干净利索，一语破的。

然而，就单个的肉体来说，从历史的角度看，衰老和死